

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嬗变

刘昌鑫*

内容提要 拥有近 7000 年历史的埃及，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政治传统。自 1952 年 7 月革命之后，当代埃及共经历了五个时期，分别是纳赛尔时期、萨达特时期、穆巴拉克时期、穆尔西时期以及当前的塞西时期。综观四位总统的执政历程，可以看出他们在获取政治合法性方面，呈现出由革命到选举的趋势；在维持政治合法性方面，呈现出由依靠民众到依靠精英的特点；而在丧失政治合法性方面，则呈现出由战争失利到军人干政的态势。通过回顾当代埃及总统获取、维持以及丧失政治合法性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中勾勒出埃及政治演进的轨迹，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埃及未来的政治走势。

关键词 埃及 政治合法性 总统制

在涉及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合法性时，西方学者往往忽视政治合法性在中东统治者头脑中的重要性。他们倾向于将中东政权的政治合法性与权力、威权、镇压相联系，即认为中东统治者主要依靠武力来维持统治。但是，中东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深深根植于中东国家的历史，并与中东统治者获得政权的方式密切相关。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享有独特的地位，经常被阿拉伯人称为“母亲国”^①，其政治发展历程最能代表当代阿拉伯国家统治模式的演变趋势。自 1952 年“七月革命”以来，当代埃及历史上一共产生了五位重要的总统，他们分别是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穆尔西以及现任总统塞西。纳赛尔时代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奠基时代，实现了埃及的彻底独

* 刘昌鑫，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① Maria J. Stephan, *Civilian Jihad-Nonviolent Struggle, Democratiz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269.

立,奠定了埃及现代化的坚实基础。萨达特时代是埃及的改革时代,在经济、政治以及外交领域进行了重大调整。穆巴拉克时代是埃及的调整时代,在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曲折探索。穆尔西时代则是埃及的过渡时代,是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探索,以及伊斯兰势力执掌国家政权的初步尝试阶段。这四个时期各有特色,是当代埃及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时期,同时也是埃及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重要阶段。本文试图解读前四任总统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沿革,把握埃及当代社会演变的轨迹,以便我们更好地把握埃及政治进程的未来走向。

一 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历史遗产

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具体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采用的主要是西方学者的定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合法的统治大体区分为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认为政治统治需要依赖客观有效性和主观有效性两个基础。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有赖于自身在事实上的被承认。^① 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则认为,合法性是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及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这种认可需建立在三个条件之上:首先要获得被统治者的赞同和认同;其次要符合社会的价值观念,获得社会认同;最后必须合乎法律性。^② 三位学者对合法性的论述对我们探讨世界各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者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强调了被统治者对统治认同的重要性。总体而言,政治合法性的主体主要涉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因而难以用某种具体的理论框架予以概括。这就需要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践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准确把握其政治合法性的内涵,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需求。

作为地处亚非欧三洲交界处,经受过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

①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184页。

② [法]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1~3页。

明以及地中海文明浸润的埃及，其政治合法性有着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历史印记。埃及的统治模式深受各种文明以及自身地域相对封闭性的影响，政治合法性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体现出一种复杂多形态的特征。从古至今，埃及民众主要居住在尼罗河谷地和三角洲地区，呈现高度聚居的特征。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将埃及称为“尼罗河的赠礼”，时至今日仍不为过。可以说，埃及是一个建立在尼罗河上的国家。在一个大河文明系统中，统治者控制河水的供应必不可少，并充当着人与河水的中介。人要生存，一方面需要依赖河水和灌溉，另一方面又需要政权建立稳定的秩序，因而一个掌控河水的使用以及兴修水利的官僚机构应运而生。为了维系生活，务农者之间还需要密切合作，共同分享和利用河水。对合作以及强有力的政权的需要使务农者极易接受极权政府并顺从其统治。一位埃及学生曾经写道：“专制与顺从、压迫与献媚是埃及人在历史长河中最显著、最恶劣的特征，是埃及历史剧中的主旋律；如果一个人否认这些，那么就不懂埃及的历史。”^① 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多样化的文化构成，塑造了埃及特定的政治模式与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集权传统。从古代的法老到当代的穆巴拉克，埃及最高统治者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呈现出传统体制的延续。

埃及的伊斯兰化进程持续时间最长，对当代埃及的影响也最大。伊斯兰教不仅涉及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伊斯兰教是探讨伊斯兰国家政治合法性不可回避的重要方面。《古兰经》明文规定，“天地万物都是真主的，万事只归真主”。^②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你们不要使你们的善功无效。”^③ 传统伊斯兰世界的理论强调君权神授和君权至上的政治原则，强调君主的统治权力和臣民的从属地位；统治者是臣民的牧人，统治者将为自己的行为和臣民的行为对安拉负责，而选择统治者和惩罚统治者的权力只属于安拉。所谓臣民终止顺从统治者和反抗统治者的相关规定只是理论上的虚构和道义上的

① Derek Hopwood,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 - 1990*, Oxford: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1991, p. 6.

② 《古兰经》，马坚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1页。

③ 《古兰经》，马坚译，第260页。

制约, 现实意义微乎其微, 而忠君思想则是传统伊斯兰政治理论的实质所在。^① 但是随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穆斯林穆兄会自 1928 年以来, 伊斯兰主义者对传统伊斯兰宗教理论进行了重新解释和修订, 使伊斯兰教成为下层民众对抗精英阶层的重要工具。在真主的至高无上权力与代治者实际权力之间, 不再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弹性, 并对当代埃及总统的政治合法性构成理论上的支持与挑战。

埃及独特的历史赋予其政治合法性特定的内涵,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处于既对立又合作的状态。一方面, 埃及民众对于政府有着天然的服从感与依赖感; 另一方面, 当生活难以为继时, 民众又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和自主性。这种状况在很多情况下造成统治者的治理能力成为其获取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因素, 这也是不同于西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显著特征。

二 从革命到选举: 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法理之路

二战之后, 埃及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远未完成。埃及人长期以来就希望摆脱两种势力的控制, 一是腐败的法鲁克王朝, 二是暴虐的殖民主义者。“铲除殖民主义统治和殖民特权, 是几代埃及民族主义者追求的目标。”^② 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自成立后, 致力于推翻封建王朝的统治, 削弱地主的权力, 消除外国影响, 并革除政治生活中的腐败。^③ 自由军官希望埃及能成为拥有平等机会并能平均分配资源的国家。1952 年 7 月革命之后, 自由军官组织废黜了法鲁克国王, 并致力于清除外国势力。在实现独立的过程中, 埃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显著增强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合法性, 并逐渐使纳赛尔成为埃及民族与民众的代言人。从纳赛尔个人角度来看, 他的自身品质又赋予其统治一定的克里斯玛色彩。在处于动荡之中的埃及社会, 广泛存在希望“救世主”降临以迅速解决危机的诉求。纳赛尔是一

① 哈全安:《中东史: 610—2000》(下),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 第 928 页。

② Kirk J. Beattie, *Egypt During The Nasser Years: Ideology,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 19.

③ Peter Mansfield, *Nasser's Egyp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5, p. 43.

位年轻而充满活力的政治领袖，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他与之前出生于国外，以及腐败堕落的阿里王朝的继承者对比鲜明。纳赛尔充分利用个人天赋去满足这种诉求，他充满感染力的演讲，以及将象征民族独立与尊严的苏伊士运河收回，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拥护。纳赛尔不仅被视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而且成为第三世界反帝反殖的一面旗帜。纳赛尔的个人魅力再加上国家媒体的大力宣传，纳赛尔逐渐成为典型的克里斯玛型人物。“在长期的民族运动中，纳赛尔领导人民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殖民统治者，使埃及摆脱了从属于西方的地位，并使埃及在第三世界跻身具有巨大影响的主权国家之列。”^①可以说，纳赛尔政权“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的典型产物，即获取独立或者实现独立发展的产物”。^②纳赛尔政府获得了各阶级的支持，其合法性的根基得以夯实。

纳赛尔自1967年战争之后郁郁寡欢，不久便与世长辞。在纳赛尔的葬礼上，埃及人不仅为纳赛尔悲伤，而且为自己随之丧失的希望悲伤。^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萨达特接任总统职务。借助法制来为自身行动正名，萨达特清除了萨布里势力，稳定了局势。1971年，埃及颁布了永久宪法，突出强调了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宣布埃及是一个“法律之邦”。萨达特还赋予司法部门一定的自由，并宣布结束因政治和宗教信仰不同而随意拘禁反对派的状况。

萨达特接手的是一个充满问题与矛盾的政权，特别是“六七战争”后，埃及社会笼罩在经济困境以及军事失利的阴霾之下。一方面，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控制了半岛上的油田，阻断了苏伊士运河，导致石油收入锐减，运河停运；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士气不振，急于一雪前耻的呼声充斥在埃及社会的上空。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外交领域的突破是萨达特解决合法性困境的主要途径。为了打破中东地区“不战不和”的局面，凸显埃及的重要地位，同时提高自身的威望，萨达特在1973年10月发动了斋月战

① Raymond A. Hinnebusc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The Post-Populist Development of An Authoritarian-Modernizing Sta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3.

② Raymond A. Hinnebusc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The Post-Populist Development of An Authoritarian-Modernizing State*, p. 2

③ Thomas W. Lippman, *Egypt after Nasser: Sadat, Peace, and The Mirage of Prosperity*,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89, p. 1.

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这场战争向世界表明了阿拉伯战士能够在同等条件下策划和参加战斗，是一场重获自尊、动摇超级霸权统治的斗争，是“埃及历史上跨越到新阶段的精神之旅”。^①对萨达特来说，此次战争增强了阿拉伯国家的自信，加重了他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的筹码，最主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萨达特的威望，使其成为一位颇受欢迎的领袖。萨达特开始拥有克里斯玛的光环，其政治合法性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

纳赛尔依靠清除封建势力获得权力，萨达特依靠击败左派势力获得权力，而穆巴拉克则是继承了权力。^②当穆巴拉克接任总统职位时，除了拥有萨达特政府的副总统职衔，还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基础。穆巴拉克不属于发动“七月革命”的自由军官组织成员，是纯粹的行伍出身，与其他政客几乎没有瓜葛，与各种政治势力也没有恩怨。正是在这个继承的基础上，他积极与各种政治势力进行协商。穆巴拉克最直接的敌人是极端宗教组织，他暂时性地建立了一个更加广泛的民族阵线，拉拢温和的伊斯兰组织，鼓励左翼和中右翼世俗主义反对派的发展，阻止宗教势力的过分强大。穆巴拉克担任总统后首先释放了在萨达特被刺杀前关押的 31 名主要政治犯，赋予反对党更多的行动自由，强调媒体独立的重要性。穆巴拉克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在决策前经常咨询各方的建议，因而能够融合各种政治势力，扩大自身的政治基础。^③至于萨达特时期非常普遍的腐败问题，穆巴拉克则象征性地审判了萨达特的哥哥伊斯马特作为替罪羊。媒体对此展开大篇幅报道，向公众展示新政府致力于清除腐败和利益集团的形象。

与前任总统不同，穆巴拉克更关心其统治权的合法性，他将自己描述为法律的执行者。^④穆巴拉克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言论显示出政府致力于依法治国的计划，他表示将会尊重公民的平等权利，保证司法的相对独立，以及依法实施统治。在一次演讲中，他宣称依法治理是“政府统治的基础……任何政府都不能干预法庭事务和正义……自从我依据法律规定

① Derek Hopwood,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 - 1990*, p. 108.

② McDermott Anthony, *Egypt from Nasser to Mubarak: A Flawed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75.

③ McDermott Anthony, *Egypt from Nasser to Mubarak: A Flawed Revolution*, pp. 74 - 77.

④ Hesham Al-Awadi, *In Pursuit of Legitimacy: The Muslim Brothers and Mubarak, 1982 - 2000*,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4, p. 53.

接任总统职位的第一天起就有这样的信念”。^① 在其执政早期，穆巴拉克并没有利用自身总统职权去强迫法庭出台限制社会和政治自由的新法令。相反，法庭则发起了一系列虽受到限制却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带来显著变化的法律改革。

1984年5月，埃及举行了历史上相对公平的一次议会选举。为保证选举进程的稳定性以及选举结果的可信性，穆巴拉克与政治反对派进行了协商，允许穆兄会与新华夫脱党联盟参加议会选举。通过将各种反对派势力纳入政治体制，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反对派势力的安抚与操控，同时孤立极端势力。在此次选举进程中，穆巴拉克再次强调自己将尊重宪法以及人民的选择。通过政治领域的协商以及部分自由化举措，穆巴拉克释放了大量的社会张力，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得以逐渐建立。毫无疑问，穆巴拉克利用此次选举使得“选举合法性变成其政治合法性的新源泉”。尽管埃及的政治自由与民主仍是相对的，但是穆巴拉克总统在执政初期塑造了“民主总统”的形象，稳固了统治。

此外，穆巴拉克对萨达特的外交政策进行了修订，与以色列维持了一种“冷和平”的关系，部分地迎合了民众和阿拉伯国家的情感需求。此外，他还积极修复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并最终于1989年重归阿拉伯世界的怀抱。穆巴拉克的多边外交政策，为其进一步获取合法性提供了广阔空间。

2011年突尼斯政治地震的外溢效应首先波及埃及，在民众的大规模抗议声浪中，穆巴拉克总统被迫在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在随之而来的权力角逐中，穆兄会凭借自己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严密的组织宣传网络脱颖而出。在2011年底到2012年初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支持的自由与正义党（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获得了总选票的47.2%，占议会498个席位中的235席，而更加保守的萨拉菲主义努尔党则获得了总票数的24.3%，占有121个席位，伊斯兰主义者因此获得了人民议会中总席位的73%。^② 在2012年举行的协商会议中，自由与正义党获得了106个席位，光明党则获得了43个席位。至此，埃及上下两院都被伊斯兰主义者控制。这

^① Hesham Al-Awadi, *In Pursuit of Legitimacy: The Muslim Brothers and Mubarak*, 1982 - 2000, pp. 54 - 55.

^② “Egypt’s Islamist Parties Win Election to Parliament,” *BBC News*, 21 January,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middle-east-16665748>, 2013 - 01 - 22.

种结果虽然让国际社会感到震惊, 却有其社会必然性。

穆斯林穆兄会是埃及乃至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伊斯兰政治组织, 在穆巴拉克时期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当被禁止在现存体系内运行时, 穆兄会便积极转向其他途径, 比如为那些有需要的底层民众提供包括教育和医疗在内的社会服务来实现自身诉求。^① 埃及贫穷落后的地区经常遭到政府的忽视, 而穆兄会则很早就在这些地区开展社会服务。穆兄会通过自身的社会福利网络以及宣教活动, 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② 在开罗的一个贫民窟埃兹拜特·哈戛纳 (Ezbet El Haggana) 地区, 穆兄会很早就在本地提供医疗等社会服务。当地居民称自由与正义党 (Freedom and Justice Party, 简称 FJP) 是唯一到达本地区的政党。他们声称将会投票支持穆兄会, 因为只有他们关心底层民众, 并能将把埃及变得更好。正如一位埃及人所言: “在警察局, 无辜的穷人遭到拷打和虐待, 而窃贼却未受到惩罚, 那些执行正义的人并没有带来正义。我们需要伊斯兰, 我们需要正义。”^③ 在塞得港的竞选过程中, 当地一位 41 岁的学校职员雅海尔·赛义德 (Yehia el-Sayed) 则说道: “穆兄会为人民服务, 因此只有让他们当选议员, 才能做得更多。”穆兄会稳固的社会基础, 为穆尔西在总统选举中胜出埋下了伏笔。

尽管过渡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削弱穆兄会的权力, 但是在 2012 年 6 月举行的埃及历史上第一次民主总统选举中, 穆兄会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获得了总选票的 51.7%, 击败了穆巴拉克政府前总理艾哈迈德·沙菲克 (Ahmed Shafiq)。^④ 虽然穆兄会总统候选人穆尔西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 但却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经自由选举产生的非军人背景出身的总统,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并一度被认为是埃及民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① Najib Ghadbian, *Democratization and Islamist Challenge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67-68.

② Kristen Chick, “In Egypt Elections, Secular Parties Rally to Stop Islamist Tid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14, 2011,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1/1214/In-Egypt-elections-secular-parties-rally-to-stop-Islamist-tide/> (page) /, 2011-12-16.

③ Kristen Chick, “Egypt Vote is On, Despite Deadly Protests. How will The Muslim Brotherhood do?”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7, 2011,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Middle-East/2011/1127/Egypt-vote-is-on-despite-deadly-protests.-How-will-the-Muslim-Brotherhood-do>, 2011-11-30.

④ Muge Aknu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Politics in Egypt: From Moder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Uluslararası Hukuk ve Politika*, Vol. 9, No. 33, 2013, p. 3.

的事件。这不仅进一步增加了穆兄会角逐埃及政坛的实力，而且也成为穆尔西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三 从民众到精英：维持政治合法性的社会基础

在七月革命前，埃及存在“半个社会”，少数人控制埃及大多数资源以及政治生活。根据英国对当时埃及收入分配所做的报告，1%的人口中，每个家庭的收入超过1500磅，而其余80%的人口中，每个家庭获得的收入则不超过240磅。^①“贫穷，无知以及疾病”充斥社会，被自由军官描述为埃及社会的“地方病”。权力分散在不同的社会团体中：议会由乡村贵族把持，他们很大程度上由文盲的民众选举产生；政府由半封建的地主控制；商业以及工业大亨控制着社会中巨大的权力。^② 尽管自由军官组织在革命之初尚没有政治实践和意识形态，但是在革命后则迅速填补了政治空白。^③ 在纳赛尔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打破革命前的阶级体系，并推动社会流动。法鲁克王朝的统治基础为王室成员、大地主和外国资本家，自由军官组织将这些阶层逐渐消灭，并代之以包括军队、公务员阶层以及国企工人的统治联合。

维持统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仅靠个人魅力和反帝反殖政策难以持久，“民族尊严和社会正义”的实现需要坚实的社会基础。通过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纳赛尔明显改善了埃及农民的处境，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从1956年开始，纳赛尔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措施，为普通埃及人建立了稳定的社会福利体系。政府为民众提供补贴面包、教育免费以及健康服务，并为新毕业生安排工作岗位。1952~1969年，大学生增长了3倍，而技校生则增长了6倍。^④ 政府保证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工作分配，进一步扩大了自身的阶级基础。纳赛尔政府在民众与国家间逐渐建立起稳固的社会契

① Galal A. Amin, *Egypt's Economic Predicament: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xternal Pressure, Political Folly and Social Tension in Egypt, 1960 - 1990*, New York: E. J. Brill, 1995, pp. 131 - 132.

② Lillian Craig Harris, *Egypt: Internal Challenge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88, p. 11.

③ Peter Mansfield, *Nasser's Egypt*, p. 44.

④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22.

约, 通过为日渐壮大的中产阶级提供社会服务来换取他们的政治沉默。与此同时, 政府部门不断膨胀, 扩展至社会的各个方面, 职业协会、工会、志愿者协会以及大学校园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

1962 年 5 月 21 日公布的“民族宪章”详细地阐述了纳赛尔的政治经济政策, 其中包括重新分配财富, 确保民众是唯一的受益者, 以及消除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异等措施。在纳赛尔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进过程中, 国家体制进一步完善, 对社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① 政治经济政策的推进、威权体制的强化以及社会契约的达成呈现三位一体的形态, 民众对政府的依赖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同步演进。纳赛尔逐渐建立起一个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威权统治, 总统是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统帅, 有权任命和解散内阁、官员和军官, 解散议会, 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 宣布战争, 以及实施紧急状态法等。^② 议员只能由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成员担任, 议会则仅仅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机构, 充当了纳赛尔政府的橡皮图章。^③ 通过国家社团主义的形式, 埃及政府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纳赛尔政府不仅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 而且拥有了合法性的保障。

萨达特在上台伊始, 便开始采取一系列去纳赛尔化的措施。与纳赛尔依靠民众维持统治不同, 萨达特主要依靠穆兄会和资产阶级的支持来维护统治。尽管这些阶层受到纳赛尔政府的残酷打压, 但是他们在社会中仍蕴藏着巨大的威力。在担任总统两个月之后, 萨达特就下令取消没收和充公政策, 确保个人自由、安全以及每个人的诉讼权利。^④ 这是他采取的不同于前任的第一项举措。此后, 萨达特采取了一系列取悦资产阶级的行动, 不仅归还他们被没收的资产, 而且取消了“政治孤立”, 允许富有的家庭重新回到政治生活。^⑤ 萨达特还从监狱中释放了遭纳赛尔囚禁的穆兄会成员, 恢

① Amos Perlmutter, *Egypt: The Praetorian State*, New Jersey: Transaction Books, 1974, p. 128.

② Ali El Din, Hila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Egypt, 1803 - 1999*, Cairo: Center for Political Research and Studies, 2002, p. 178.

③ Ali El Din, Hilal,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Egypt, 1803 - 1999*, Cairo: Center for Political Research and Studies, p. 183.

④ Mark N. Coop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gypt*,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68.

⑤ Raymond A. Hinnebusch Jr., *Egyptian Politics under Sadat: The Post-Populist Development of An Authoritarian-Modernizing State*, pp. 29 - 30.

复了穆兄会的组织机构以及财产和资源，并允许自 1960 年开始流亡国外的穆兄会成员返回国内。穆兄会的总部得以恢复，重新参与公共活动，并恢复出版公共刊物。萨达特还鼓励在艾资哈尔清真寺之外成立独立的宗教中心，建立不受政府控制的清真寺。萨达特将自己刻画为一位“虔信安拉的总统”，利用宗教合法性来提升个人威望。通过依赖穆兄会和资产阶级，萨达特不仅在权力斗争中脱颖而出，而且可以开展进一步的经济政治改革。

1974 年，萨达特公布了十月文件，宣布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允许埃及人和外国人自由进口科技和设备。他们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和出口退税，自由从事银行和商业活动，并可以自由投资项目。^① 政府的政策导致私人资产阶级发展迅速，成为萨达特政权的坚实基础。石油、运河、侨汇，以及旅游收入在开放政策期间带来持续不断的外汇收入，这四项收入在 1974 年为 6 亿美元，到 1983 年达到 75 亿美元。埃及政府还积极寻求外援，仅在 1974 年，埃及就获得阿拉伯国家 12 亿美元的援助，1974 ~ 1977 年又获得了阿拉伯国家 70 亿美元的援助。^② 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使其可以通过转让财富的形式，扩大政权基础。在此过程中，私人资产阶级受益最多，成为所谓的“肥猫阶层”。

萨达特不仅给予资产阶级实际的经济利益，而且还赋予其部分政治自由。通过让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组织享有一定的自主性，萨达特政府能够部分地满足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并使其在社会中享有特权地位。伴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萨达特政府还鼓励成立一些新的商业协会，他们主要代表新近崛起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有成立于 1975 年的美国记者协会和 1977 年的埃及商人协会。协会享有很大的金融与行政自由，与政府关系密切，推动有利于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与法规的出台和实施。在扶植资产阶级的同时，萨达特还采取了严厉限制工人与农民权利的措施。1976 年，埃及政府直接取缔农民联合会，进一步弱化农民影响政策的能力；而在 1976 年和 1981 年，政府则两次修订了工会法，加强了对工人的金融与行政

① Mark N. Coop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gypt*, pp. 104 - 105.

② Marvin G. Weinbaum, *Egypt and The Politics of U. S. Economic Aid*, Westview Press, 1986, pp. 637 - 638.

控制。^①工人和农民阶层受到政府的压制，而资产阶级则成为开放政策和政治自由化政策的主要受益群体。资产阶级逐渐构成了萨达特政权的基础，并与萨达特政府建立了新的社会契约。

穆巴拉克上台之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他既没有回归到纳赛尔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沿袭萨达特的消费性开放政策，而是在两者间寻求平衡。埃及经济逐渐由消费性开放转为生产性开放，并在探索中实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穆巴拉克总统在执政前期，由于对 1977 年面包骚乱仍心有余悸，在经济社会改革方面非常谨慎，即使在外国势力的压力之下，也未推行激烈的变革措施。在他统治的最初 20 年中，穆巴拉克政府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重新调整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②为了应对经济困难的状况，他更多地倾向于通过举借外债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维持对生活必需品的补贴，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值得一提的是，埃及的基础设施在穆巴拉克时期获得巨大发展。从 1991 年开始，穆巴拉克在经济领域逐步开始实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主导的经济社会调整计划，经济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

在萨达特时期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穆巴拉克稳定政治经济的措施而日益强大。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依赖资产阶级来应对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困难，限制伊斯兰势力的增长。^③尽管埃及政府与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政府试图取悦任何更温和并愿意协助其实现政治经济目标的阶层，两者逐渐呈现出联合的趋势。从 1991 年开始，商人阶层利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来进一步拓展自身的经济利益。商人俱乐部的影响进一步扩展，其中包括埃及商人俱乐部，与美国驻开罗大使关系密切的美国商人俱乐部，埃及—美国商人俱乐部，以及埃及—法国商人俱乐部等。商人俱乐部甚至能够直接干预埃及政府的政策。穆巴拉克总统的儿子贾迈勒最初就在由埃及—美国商人组成的游说团体“总统委员

① Dina Shehata, *Islamists and Secularists in Egypt : Oppos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29 - 30.

② Fouad N. Ibrahim and Barbara Ibrahim, *Egypt: An Economic Geography*, New York: I. B. Tauris, 2003, p. 95.

③ Mekay, Emads, "Egypt's Economic Reforms Release A New Genie," *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Vol. 15, No. 1, 1996, p. 22.

会”董事会中任职，而且许多政府高官的儿子也是商人。埃及政府赋予商人团体诸多特权，而商人团体则积极协助政府内外政策的实施。

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还积极寻求政治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资产阶级开始大量加入民族民主党，进而借助政党平台进入议会，谋求政府高级职位，私人资产阶级与国家资产阶级逐渐实现联合。^① 通过利用基于单独候选人基础上的1990年选举法，资产阶级积极参加被大多数政党抵制的1990年选举，以获取政治影响。1995年，他们在人民议会中获得了71个席位，与1990年的31个席位和1987年的14个席位对比显著。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最大的集团是所谓的“独立”候选人，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共获得了213个议会席位。随后，这些独立候选人加入了民族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简称NDP）的议会阵营，使NDP在议会中的席位达到388席。^② 由于私人资产阶级议员的加盟，政府依然确保了在议会中的多数席位。2004年，在艾哈迈德·纳杰夫的政府中囊括了大批商人。^③ 政府与资产阶级实现了结盟，资产阶级不仅成为穆巴拉克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撑，而且成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盟友。

以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主义者主要由律师、医生、记者、机械师等中产阶级构成，主要代表的是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与以军队、国家安全机构、法官，以及资产阶级等精英集团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但是这些精英集团早已渗透整个社会体系，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商人官僚寡头集团的利益，甚至能直接左右埃及的政局。^④ 在总统竞选之前，穆巴拉克政府前总理沙菲克在美国商会午餐会上，宣称会使用暴力手段来恢复秩序，并不断嘲讽伊斯兰主义者，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⑤ 当伊斯兰主义者在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选举中取得胜利之后，旧体制的精英阶层便千方百计进行阻挠。2014

-
- ① Dina Shehata, *Islamists and Secularists in Egypt: Oppos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p. 35.
- ② Denis J. Sullivan, "The Struggle for Egypt's Future," *Current History*, Vol. 102, No. 660, 2003, p. 28.
- ③ Abdel-Fattah Mady, "Popular Discontent, Revolu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gyp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 20, No. 1, 2013, pp. 320-321.
- ④ Maha Azzam, "Egypt's Democratic Experiment: Challenges to A Positive Trajectory,"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2, 2013, p. 158.
- ⑤ David D. Kirkpatrick, "Egyptian Is Counting on Worries of Elite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5/28/world/middleeast/ahmed-shafik-counting-on-egyptian-elites-fears.html?pagewanted=2&r=1&ref=world,2012-05-29>.

年 4 月 8 日, 埃及行政法院宣称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 50 名成员违反了军队的宪法宣言, 终止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并规定只有在选举出总统之后, 才能起草新宪法。^① 2012 年 6 月 12 日, 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声称议会选举所依据的法律违宪, 宣布解散刚选出不久的人民议会。^② 在总统投票前, 军队又发布了新的宪法宣言, 剥夺了总统的大量权限, 并赋予军队在宪法起草进程中稳固的地位。^③

虽然穆尔西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宣誓就职, 但是总统职位空有虚职, 权力受到极大限制, 国家大权依然掌握在前政府官员以及军方手中。在竞选胜利后的演讲中, 穆尔西试图扩大统治基础, 声称“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 我们都是埃及人”, “我们将一起应对危害我们民族团结的冲突和阴谋”。^④ 上台伊始, 穆尔西便致力于巩固自己的统治根基, 打击旧政府的精英阶层, 扶植自身的精英势力, 组建了以甘迪勒为首的新内阁。在其担任总统八天后, 穆尔西颁布法令宣布最高宪法法院解散议会的法令无效, 力图恢复被解散的议会的工作。^⑤ 在 2012 年 8 月 5 日西奈半岛发生 16 名埃及军人被极端分子杀害的事件后, 穆尔西借此罢免了内政部部长, 海军部、空军部以及空军国防指挥部部长的职务, 埃及国防部长坦塔维以及总参谋长阿南的职务也在 8 月 12 日被解除。^⑥ 穆尔西进而任命较年轻的军官塞西担任国防部长, 试图建立自己的精英阶层。在 9 月 3 日, 穆尔西勒令 70 多名将军提前退休, 削弱了军方的实力, 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和埃及年轻革

① David D. Kirkpatrick, “Court Flips Egypt’s Timetable: Election, Then Constitution,” *New York Times*, April 10,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4/11/world/middleeast/court-flips-egypts-timetable-constitution-now-follows-vote.html?_r=1&ref=world, 2012-04-15.

② David D. Kirkpatrick, “Blow to Transition as Court Dissolves Egypt’s Parliament,” *New York Times*, June 14,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6/15/world/middleeast/new-political-showdown-in-egypt-as-court-invalidates-parliament.html?pagewanted=2&ref=middleeast>, 2012-06-16.

③ Nathan J. Brown, “Egypt’s Failed Tran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4, 2013, p. 48.

④ Kareem Fahim, “Challenges Multiply for Presidential Winner in Egypt,” *New York Times*, June 24,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6/25/world/middleeast/challenges-multiply-for-victor-in-egypt.html?ref=middleeast>, 2012-07-02.

⑤ Taha Ozhan, “New Egypt Versus the Felool: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sight Turkey*, Vol. 15, No. 1, 2013, p. 17.

⑥ Gregory Aftandilian, “Dilemmas for US Strategy: Pitfalls in Egypt,” *Parameters*, Vol. 43, No. 3, 2013, p. 8.

命者的支持。穆尔西通过强迫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及埃及前政府高官辞职，让土耳其经历的政治进程在埃及于一个月內完成。穆尔西还对政府人士构成进行了重大调整，组建了总统顾问委员会，并任命多名穆兄会成员担任新省长职务。2012年11月，穆尔西总统还签署一项法令，任命其支持者担任埃及工会委员会的相关职务。^① 通过将旧政府的精英阶层替换为自身的精英阶层，穆尔西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能力有所增强。

穆尔西深知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因而积极采取措施发展经济。担任总统后，穆尔西推出“百日复兴计划”，稳定国内形势，恢复旅游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政府还适时推出“伊斯兰债券”，募集稳定和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在2012年10月，穆尔西宣称将会追缴那些逃税的经济寡头的欠款。为推动埃及的均衡发展，正义与发展党还试图将投资转向开罗和亚历山大之外的地区。他们计划将30%的资金投向上埃及地区，22%投向苏伊士地区，15%投向三角洲地区。^② 在立足国内之外，穆尔西还通过积极参加非盟组织会议以及不结盟会议，开展“平衡外交”，改善自身外交处境并努力寻求外援。在穆尔西任期内，埃及从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国家获得了130亿美元的贷款和捐赠。^③ 外援的到来为穆尔西政权提供了缓冲时间，有利于穆尔西政府各项政策的开展。

总体而言，穆尔西并未摧毁旧政府精英阶层的统治，因而埃及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由前政府的精英阶层把持。

四 从“六七战争”到军人干政：政治合法性渐失的根源

1962年，埃及出兵也门，从此陷入长达5年的战争泥潭，严重消耗了埃及有限的经济资源。大量埃及精锐部队滞留也门，直接加速了埃及在“六七战争”中的惨败。^④ 1967年战争则是纳赛尔统治方式转变的分界线。

① Muge Aknur, "The Muslim Brotherhood in Politics in Egypt: From Moderation to Authoritarianism?," p. 19.

② Maha Azzam, "Egypt's Democratic Experiment: Challenges to A Positive Trajectory," p. 166.

③ Jeremy M. Sharp, "Egypt: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frica*, Vol. 7, No. 1, 2014, p. 51.

④ Andrew McGregor,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The Ottoman Conquest to The Ramadan War*,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6, p. 259.

战争的惨败不仅降低了埃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削弱了纳赛尔在国内外的形象，而且严重损害了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尊心。“六七战争”之后，西奈半岛被以色列占领，运河区也被阻断，埃及因此失去了重要的石油和运河收入。由于过度发展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经济效率低下。纳赛尔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遭遇全面危机，不能继续维持相应的庇护与服务，民众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影响。人们开始表达自己的心声，要求保障人们的自由与权利。1968 年，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工业城市哈勒万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人涌上街头，要求严惩导致战争失利的将领。^① 此次游行带有反政府的论调，很多警察和政府官员受伤。在此次骚乱中，学生、工人、知识分子等各个阶层起草了共同宣言，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议会，享有自由的媒体，谴责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专制并要求将其解散。这是纳赛尔政权建立 16 年之后，民众首次公开挑战纳赛尔的权威，表达自身的沮丧与不满。^② 尽管纳赛尔自身的威权惯性和社会契约的持续实施使其统治得以维持，但是纳赛尔的威望已经受到极大削弱。纳赛尔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包括专业人员、小商人以及政府雇员，但此时他们也开始要求更多权利。1968 年，纳赛尔被迫在演讲中做出改革的承诺，放松了对职业协会的控制，经济也逐渐向温和的自由主义模式转变。纳赛尔的克里斯玛光环和革命合法性已难以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被迫转向其他更加理性和温和的统治方式。

在纳赛尔体制之下的政治合法性根基，可以称之为“专制庇护下民众的服从”，当政府不能提供相应的庇护与服务，合法性的基础也会逐渐动摇。尽管纳赛尔逝世后，埃及民众非常悲伤，但是“一旦眼泪退却，一种解脱感也随之出现”。^③ 纳赛尔时期主要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奠基时代，因而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刚刚开始显现，但是埃及在 1967 年战争中的失利，则直接阻断了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在特定时期内成为纳赛尔合法性遭到削弱的决定性力量。

随着萨达特开放政策的实施，埃及商人为了逃避社会法规，获得更大

① Mahmoud Hussein, *Class Conflict in Egypt: 1945 - 197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p. 294.

② Derek Hopwood,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 - 1990*, p. 81.

③ McDermott Anthony, *Egypt from Nasser to Mubarak: A Flawed Revolution*, pp. 43 - 44.

的利润，将自身的活动大量转向自由区，且集中在商业活动领域，以满足不断扩张的国际贸易需求。在自由区的投资占到总投资的75%，集中在石油、住房、旅游以及建筑等行业，由于食品加工工业利润较低，且存在被国有化的风险，因而投资严重不足。随着各种进口商品的增多，消费品市场显著扩大，贸易赤字持续上升，在1975/1976年度占到GDP的20%。^①到1977年末，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自由化是失败的。萨达特的开放政策并未带来经济的显著改观，反而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导致中低阶层怨声载道，萨达特政权处于空前危机。当政府在1976年年底宣布取消对一些生活必需品的补贴之后，直接引发了1977年的“面包骚乱”。这更加突出了社会契约对维持政府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性。1977年的“面包骚乱”，折射出萨达特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已经显现。

萨达特时期采取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动摇了其社会基础，导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在萨达特时期重新涌现的资产阶级，大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巨额利润，拥有“惊人的消费欲求”。这个富人阶层，主要由中间人、委托商，以及商人构成。^②人们对这个阶层极其厌恶，称之为“寄生阶层”。与此同时，官僚阶层以权谋私的现象也层出不穷。萨达特本人及其妻子非常偏爱国外商品，追求奢侈的生活方式。总统身边的人员及政府要员也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国家资产、谋取私利。部长或者高级官员可以从国有商店中获得免费或者受到高额补贴的商品，并可以从重要的交易中收取回扣。不管是非法建筑、进口非法货物的许可，还是逃税漏税，都可以通过贿赂实现。^③

萨达特时期国内普遍的腐败现象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以及萨达特执意实现埃以和平的举动，招致了社会的普遍反对，萨达特置身民众的对立面。在宗教合法性、社会合法性以及克里斯玛的光环皆黯淡之后，萨达特政府最终诉诸强权和武力维持统治，镇压穆兄会，打压世俗反对派，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政权基础。1979年，36号法第4条款明确禁止政党参与任

① Mark N. Coop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gypt*, pp. 106 - 107.

② Hamied Ansari, *Egypt: The Stalled Socie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6, pp. 183 - 184.

③ Galal Amin, *Egypt in The Era of Hosni Mubarak: 1981 - 2011*,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11, p. 8.

何与 1952 年和 1971 年革命观点不同的活动，禁止从事违反沙里亚法、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主社会体系以及埃以和平的行为。^① 1980 年通过的《耻辱法》(The Law of Shame)，禁止“鼓动反对、憎恨或者挑战政府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系统”的行为以及“广播或宣传干扰公众观点的虚假或者误导性的新闻或信息”。^② 这项法律还要求成立一个道德法庭，使政府可以随意侵犯民众的政治权利，实施家庭逮捕，禁止个人旅行，并可以终止私人经济活动。^③ 萨达特被暗杀后，民众对于他的逝世没有任何悲伤，凸显出其政治合法性已彻底丧失。

穆巴拉克在执政初期采取中间路线，虽然暂时稳定了经济，但是总体经济形势并未出现好转。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由于缓慢的增长率，高额的公共支出以及激增的外债，埃及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埃及穷人受到巨大影响。1982~1987 年，“最低生活成本”上升了 216%，穷人消费的食物大幅下降。随着 1987 年经济结构调整措施的加速，补贴被大幅削减，像面包、大米、食糖、食用油，以及茶等食物的价格上涨迅速，自来水和电力的费用也持续上升。此外，政府开始削减社会服务支出，从 1984/1985 年度占 GDP 的 5.9% 下降到 1990 年的 4%。^④ 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在四年内下降了 40%，公务员的薪水只有 1973 年的 50%，而政府在健康、交通以及教育服务方面质量水平进一步下降。^⑤ 在 1970 年，一位大学生刚参加工作后每月的收入可以购买 68 公斤牛肉，1977 年可以购买 35 公斤牛肉，而到 2008 年则仅能够买 6 千克牛肉。^⑥ 但是，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压力下，政府进一步削减对基本商品的补贴，严重损害了埃及普通民众的利益。此外，埃及失业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居高不下，即使穆巴拉克政府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指导下进行经济改革也未带来显著改观。埃及每年净增 80 万劳动力，

① Mustafa Kamel El Sayed, *The Reality of Limited Political Pluralism in Egypt: Studies in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adbouli Books, 1996, p. 81.

② Kirk J. Beattie, *Egypt during The Sadat Years*, p. 263.

③ John Waterbury, *The Egypt of Nasser and Sadat*, p. 375.

④ Galal A. Amin, *Egypt's Economic Predicament: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xternal Pressure, Political Folly and Social Tension in Egypt, 1960 - 1990*, pp. 124 - 125.

⑤ Richards, Alan and John Waterbury,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iddle East*, Westview Press, 1996, p. 225.

⑥ Rabab El-Mahdi and Philip Marfleet, *Egypt: The Moment of Change*, London: Zed Books Ltd, 2009, p. 43.

到2008年埃及劳动力总数已达到3000万人，而失业率却一直在20%以上。失业问题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削弱了政府合法性的根基。

在普通民众为生活挣扎之时，社会上层却生活奢侈，埃及腐败问题也日益严重。尽管在伊斯马特的案件中也牵涉萨达特时期的一些部门，但是穆巴拉克拒绝将所有腐败部门进行审判。当伊斯马特被释放后，反腐败斗争也失去了其急迫性。^① 腐败无处不在，私有化进程更加剧了这个进程。国有资产被以严重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给政府相关人员。1994年，纳赛尔热水器公司（El Nasr Boilers）被以250万英镑——不足7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加拿大集团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Babcock&Wilcox），而当时仅其所占土地的价值就接近1亿美元。^② 在私有化进程中，此次交易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因而可以窥探出穆巴拉克政府中腐败问题的严重。然而这个“新掠夺性资产阶级”，却对由他们的“寄生性”活动产生的社会问题熟视无睹。^③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穆巴拉克政府的合法性受到进一步侵蚀。

自1981年以来，埃及一直处于《紧急状态法》的管控之下，警察和安全机构享有广泛的权力，可以禁止游行、审查报纸、监督个人通信、随意拘禁个人，还可以未经上诉即将被告送交特殊军事法庭受审。通过将正式的民主政治体系与国家紧急状态法相结合，穆巴拉克政府基本实现了威权政体难以完成的事情——表面上的体制化。^④ 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尽管允许反对党存在，但是却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宣称反对党应该“是不同而不是斗争，不能制造混乱……它应该是交换观点而不是相互指责”。此外，他还指出，“自由不应该危害国家安全”。^⑤ 因而，穆巴拉克在执政初期所宣称的自由仍是有限的自由，仅仅是政府对外宣传的一个标签。随着民众反抗穆巴拉克政府活动的增加，穆巴拉克也越来越依靠专制工具镇压民众。2008

① Derek Hopwood,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 – 1990*, pp. 186 – 189.

② Rabab El-Mahdi and Philip Marfleet, *Egypt: The Moment of Change*, p. 46.

③ Mona Seragledin, “Cairo 1800 – 2000: Towards Meeting The Challenge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Architec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Islamic World”, Singapore: Concept Meida Pte Ltd- for the 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 1985, p. 98.

④ Marina, Ottaway, *Democracy Challenged: The Rise of Semi-Authoritarianism*,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3, p. 32.

⑤ Derek, Hopwood. *Egypt: Politics and Society 1945 – 1990*, pp. 184 – 185.

年,至少有 1.8 万人作为“行政拘留人员”被拘禁。“无法无天”的安全部队不受制的,对普通民众的残酷虐待与拷打已经成为系统性、日常性的行动。

自 2005 年后,穆巴拉克为儿子贾迈勒继承总统职位铺平道路的意图昭然若揭,从而招致了更多反对,进一步降低了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基础。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低迷以及物价的持续上涨,导致埃及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网络的发展以及对腐败现象的揭露,进一步压缩了穆巴拉克总统的合法性空间。2011 年,在全国百万人们的抗议声中,穆巴拉克黯然下台,其接近 30 年的威权统治也由此终结。

在一个世俗威权主义体制盛行多达 60 年的国家中,已经形成了体系繁杂的军队—官僚—商人利益复合体。穆巴拉克下台后,为了控制埃及的局势,武装部队颁布了宪法补充条款,规定了议会以及总统的选举原则。因而,在穆尔西时期存在两种形式的合法性。一是宪法合法性,其将总统限制为一位政治家,并赋予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及最高宪法法院极大的权力;二是革命合法性,主要来自在解放广场以及其他地区参加抗议的成百上千的埃及民众,这是穆尔西在第二轮选举中胜出的主要原因。穆尔西不能忽视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以及宪法补充条款的合法性,因为他自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经选举产生的。同时,穆尔西还需要确保革命合法性,因为他需要在此基础上对抗埃及的利益集团。武装部队试图维持自身的地位,而革命者则要求取消宪法补充条款,恢复议会,并从政治上去除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①因而,从穆尔西上台伊始,就面临着两种合法性矛盾难以解决的困局。

穆兄会在议会以及总统选举中获得的胜利,被利益群体视为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威胁。穆尔西自担任总统开始,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就面临严重挑战。行政、金融以及安全人员,都将穆尔西视为局外人,百般掣肘。穆尔西为巩固自身统治,必须打压利益集团,压制反对派势力,然而穆尔西政府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也在削弱着自身的合法性根基。穆尔西政府要么充当不掌握实权的木偶,要么为了实权而与利益集团抗争到底,故而其只

^① Ahmed Abd Rabou, “Egypt after Elections: Towards The Second Republic?” *Insight Turkey*, Vol. 14, No. 3, 2012, p. 22.

能选择后者。穆尔西深知自身合法性的根基在于法律，故而试图控制埃及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修改宪法，进一步巩固自身统治。2012年11月22日，穆尔西发布宪法声明，宣称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以及决定，在新宪法和新议会选举产生前都具有不可更改的效力。^① 这项声明招致了早已怀疑其动机的自由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左派势力以及基督徒等的谴责。他们指责穆尔西为“新法老”，民众也举行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穆尔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爆发冲突，直接损害了穆尔西的政权基础。穆尔西政府此举显然“缺乏经验和远见，错误估计了反应”，并促使革命主义者与穆巴拉克前政府的支持者结成联合阵线。^② 尽管穆尔西很快收回了大部分充满争议的法令，但是在2012年11月30日，以穆兄会主导的制宪委员会在科普特以及自由派成员缺席的情况下表决通过宪法草案，规定沙里亚法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新宪法草案招致基督徒以及反对派人士的强烈反对，然而穆尔西却执意举行宪法公投。虽然埃及新宪法草案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但是全国仅有32.9%的选民参加了投票。^③ 这充分表明了穆尔西政权的合法性根基已经严重动摇。穆尔西希望将法官退休年龄由70岁降低到60岁，这将迫使近20%的法官离职，继而由穆兄会的律师充任。这个举动进一步被自由主义者视为穆兄会试图垄断权力的举措。在2013年的内阁改组与人事任命中，穆兄会成员担任的高层职务持续增加，招致反对派的进一步反对。

穆尔西与反对派的斗争逐渐进入白热化阶段，穆巴拉克时期的利益集团也渗透革命阵营，并使用革命暴力组织打手（baltagiya）来掀起暴力抗议。在埃及许多城市爆发反对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暴力冲突，众多的穆兄会办公室遭到攻击和焚烧。穆尔西指责这些示威者是“流氓”和“旧政权的守卫者”，穆兄会则要求舒拉委员会出台新法律，允许安全部队“控制示威，对抗流氓”，这使得冲突进一步加剧。同时，许多自由派以及左派政党和人物组成民族拯救阵线（National Salvation Front），进一步联合反对派，发起了反抗运动（Tamarod Movement），收集要求提前进行总统选举的签名。在2013年6月，埃及反抗运动的请愿活动已经收集到1500万希望穆尔西下

① Gregory Aftandilian, “Dilemmas for US Strategy: Pitfalls in Egypt,” Vol. 43, No. 3, 2013, p. 8.

② Taha Ozhan, “New Egypt versus The Felool: Struggle for Democracy”, p. 18.

③ Nathan J. Brown, “Egypt’s Failed Transition”, p. 49.

台的民众签名。^① 冲突、憎恨, 以及相互怀疑营造了一个有毒的政治环境, 穆兄会与反对派的冲突进一步使穆尔西丧失了对抗以军队为首的利益集团的基础。

在穆尔西时期, 埃及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埃及失业率在 20% 以上, 赤字占到 GDP 的 12%。自 2013 年 1 月以来埃镑已经贬值 10%, 外汇储备接近枯竭。2012 年, 政府财政收入为 197 亿美元, 但是支出却为 305 亿美元。2013 年, 财政赤字每月几乎都达到 32 亿美元。^② 经济困境, 尤其是缺乏油气以及经常性的电力中断, 增加了民众对穆尔西以及穆兄会的愤怒, 民意调查显示穆尔西的支持率已经普遍下降。贫穷、文盲以及失业关系着大多数最关心的生存问题。“这种状况的持续, 使得人们最关心的只能是安全以及餐桌上的食物。”^③ 任何政府及政治组织都需要重视这些关系生存的实际问题, 比如健康、住房、教育等。埃及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 显然增加了所谓“饥饿革命”的可能性。^④

穆尔西执政时期, 埃及没有议会, 没有宪法或者有效的行政机构, 而经济又处于崩溃的边缘, 本来需要联合最广泛的社会势力, 努力解决困境, 然而穆兄会却疏远了潜在的联盟者, 忽视了不断上升的不满, 更关注强化自身的统治, 使埃及呈现“国家穆兄会化”的态势, 进而遭到了反对派的普遍指责。穆兄会的错误在于不但无法解决危机, 反而制造危机。2013 年 6 月 30 日, 穆尔西执政一周年之际, 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再次走上解放广场, 要求穆尔西政府下台。穆尔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爆发大规模冲突, 社会进一步动荡。7 月 1 日, 埃及国防部长塞西代表军队发表声明, 要求总统和各派势力达成妥协, 否则将会接管政权。但是, 穆尔西以自己是民选总统为由拒不下台, 军方于 3 日晚宣布解除穆尔西总统的职务, 并将其囚禁, 反而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欢迎。穆尔西政府一年前在一片欢呼声中上台, 而现在又在一片欢呼声中黯然下台, 令人唏嘘不已。

① Paolo Gerbaudo, “The Roots of The Coup,” *Soundings*, Vol. 54, 2013, p. 107.

② Jeremy M. Sharp, “Egypt: Background and U. S. Relations,” p. 51.

③ Kareem Fahim and Liam Stack, “Some Disdain Both Options in Egypt’s Narrowed Race,” *New York Times*, May 26,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5/27/world/middleeast/some-in-egypt-disdain-both-candidates.html?_r=1&ref=world, 2012-05-29.

④ Maha Azzam, “Egypt’s Democratic Experiment: Challenges to A Positive Trajectory,” p. 168.

五 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演变轨迹及未来展望

从政治合法性本身来说，其既涉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又涉及统治的方式、手段以及效果。根据亚瑟·史汀斯库伯（Arthur Stinchcombe）的观点，任何政府合法性的第一个重要标志是观察当政府执行特定的政策时，政府依赖“权力源泉”的频率。第二个标志是当政府在执行其决策之时，在多大程度上被迫诉诸武力或者其他强制措施。因此，除非在政府的稳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合法性是不必诉诸压迫而获得认同的过程。^①因而，要实现政治合法性的持久，需要回归到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遵守方面，并建立完善的法制保障。依靠专制工具维持统治再难持久，走向社会发展和社会整合才是必然之路。

透过当代埃及总统政治合法性的演变轨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通向法治是埃及政治进程的必然之路。纳赛尔最初的合法性基础源于反帝反殖的特定历史环境，但是一场战争的失利却带来整个合法性危机的爆发，因而依靠意识形态维持统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萨达特上台之初即开始注重制度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在1971年9月颁布了埃及自1952年革命以来第一部正式宪法。到穆巴拉克时期，尽管法律法规徒有其表，但是政府已经发展出完善的法制体系，司法部门也享有一定的独立地位。穆尔西依靠埃及历史上最为公正的选举上台执政，将法理合法性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看出，埃及人治色彩逐渐淡化，而法制建设的作用则日益突出。

其次，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维持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保障。在实现民族独立之后，任何政权所面临的便是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摆脱奴役，进而追求有尊严的生活，是第三世界国家步入现代化的必然道路。单纯的意识形态控制难以维系，民众更加关注实实在在的生存权利。经济权利的维系和政治权力的获取，便逐渐成为民众的基本诉求。

最后，开展政治对话，形成各个阶层的常规利益表达机制是消除政治

^① Arthur L.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 162.

合法性危机的必要渠道。自纳赛尔时代以来，政府一直是民众的牧羊人，民众则视政府为衣食父母。在依赖政府供养的同时，民众对自身权利等方面的吁求也有所降低，政府与民众间维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和谐。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依赖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来获取民众的认同。但是，自萨达特时期开始，政府对于维持纳赛尔时代的契约已经力不从心。当政府通过实行部分民主化措施，积极吸引反对派势力参与政治进程时，就会强化总统的合法性基础。这在萨达特执政时期，尤其是穆巴拉克执政前期，直接关系政府的稳定。而穆尔西政府的下台，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整合的失败。因而，为各阶层建立长期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对于维持政局的稳定至关重要。

埃及脆弱的经济对 1952 年革命以来的历届政府都构成了持续的挑战。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埃及总统可以通过象征性的姿态，比如释放政治犯或者进行适当的政治改革，来改善公共形象。而在经济领域，改革则是步履维艰、周期较长、困难重重。埃及的国民收入主要有四大来源：石油、运河、旅游和侨汇。这些收入都具有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性，受国内外环境影响很大。埃及经济的“地租性”特征以及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使得自纳赛尔以后，政府已无力完全履行政府与民众间的社会契约，因而也就无法再通过为民众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来换取他们在政治上的完全沉默。纳赛尔时代的那种极权体制已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在未来已难以复制。

尽管穆尔西被军方罢黜使西方媒体惊呼埃及又进入了“阿拉伯之冬”，但是埃及社会的列车已向前开出，并不会再回到同一起点。军方的举动受到大批埃及民众的支持，而塞西在当选总统后则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许多西方国家对此感到极度困惑。综观埃及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埃及民众追求的无外乎两个方面：恢复埃及人的独立身份和实现埃及人的体面生活。当一切回归平静，只有维持和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地位，履行必要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能够取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增强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基础。正如阿瓦迪 (Al-Awadi) 所说：“在埃及，人民实际上并不关心你如何获得权力，而是关心你将如何继续维持权力。”^① 从根本上说，塞西政府

^① Hesham Al-Awadi, *In Pursuit of Legitimacy: The Muslim Brothers and Mubarak, 1982 - 2000*, p. 78.

要建立持久的统治，首先要改善埃及民众生活，以增强合法性基础，其次要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维护机制，以释放合法性危机的张力。塞西总统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局、发展经济的措施，逐渐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基础。特别是新运河的开通与运行，不但提振了埃及民众的信心，而且向世界各国展现出埃及强烈的自信姿态。与此同时，塞西政府也实施了一系列高压措施，如残酷打击穆兄会势力，限制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看似一个纳赛尔式的极权体制正在强势复归，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后穆巴拉克时代持续动荡的政治环境，塑造了塞西政府强力的镇压措施，但这种状况并不会持久，埃及政府走向法治之路是必然趋势。塞西政府能否实现社会整合，长久推动埃及社会的沉重车轮滚滚向前，值得期待。

[责任编辑：闫伟]